

山西大学古典文学研究所专刊

姚奠中论文选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

姚奠中论文选集

姚奠中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姚奠中论文选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太原和平印刷厂印刷
平阳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字数: 282千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册

ISBN 7-203-00113-5

G·66 定价: 3.75元

自序

这里收的是我四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约四十年中所写的部分论文。

三十年代后期，我开始写一些文章，但可以划入学术范围的只有两篇：一篇是《五帝本纪·书说正》，发表在《制言》半月刊上，另一篇是《魏晋玄学与老庄》，是我的研究生论文，当时交给章氏国学会和《制言》的具体负责人孙世扬先生，他说：“《制言》发表。”那时已是“七七”抗战开始以后，形势紧迫，同人星散，我也到南京转安徽，终于不知那篇文章有没有机会发表。这个集子中这两篇都没有，因为前一篇，虽找到了，但意义不大，古字又太多，非常难排，而后一篇，已无法找到。

八年抗战时期，我逃过几次难。颠沛流离，身无长物。首先是把我听章太炎先生讲《尚书》时的记录扩充写成的五十万字的《古文尚书讲疏》，遗失在安徽泗县。后来在大别山，暂时安定下来，在三年教书生活中，仍因山区一度失守而逃难两月。这前后偶然写了几篇文章发表在当地的刊物上，现在已找不全。有的只找到半篇，只好放弃。后来辗转四川，任教地点在江津、白沙。很偏僻，当地没有学术刊物。所以除只写了些文学史、庄子等文章。胜利后转贵阳、昆明，又回贵阳。这时偶然还能见到一两种，只是发行量有限。这时我

总算连续写了些东西，发表于当地和上海的刊物与日报副刊上。现在虽仍没有找全，但基本上是找到了。

解放后的五十年代初期，我从贵阳回太原。兼职多、任务重，除还要为同时所上的三、四门课作准备外，不及其他。直到1955—1957年间，才为校内外刊物写了几篇论文。这时是我精力较为充沛的时期。但从1957年末起，一下子却被剥夺了一切发言权，连已付排的文章和书稿，都扣发了，只用集体名义写了些东西。六十年代初虽已摘掉帽子，但文章内发还可以，不能外发。就这样，也写了若干篇，却从而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大批判。直到七十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算是真正解放了。1978年以来，我除把主要力量用在培养研究生并帮他们搞科研外，也较勤地发表了一些文章。但由于政治、社会活动不断增加，兼职超过了解放初期。所以发表的东西，新研究的成果较少，而未发过的旧稿和早已讲过多次、这时才整理起来的新文，占着主要部分，现在把其中的若干篇，也收入这个集子。

我是搞所谓“汉学”的。就“汉学”言，不但文史哲不分，而且以小学为基础。章门学风，愿作学人而耻作文人，自己则偏重诸子。但自教书以来，教文学史的次数却最多。中国文学史在旧大学是重头课。我到女子师范学院，接的是系主任胡小石先生的文学史课，到贵阳师范学院，接的是系主任谢六逸先生的文学史课，到云南大学，接的是系主任徐嘉瑞先生文学史课。胡、徐两先生都是因休假期离学校，谢则因病故。文学史外，常同时开过中国哲学史、《论语》、《庄子》、《韩非子》等专著和散文选、韵文选、诗词选、学术文选以至文字学等等。其中《庄子》开的次数最多。解放后的头几年，因工作需要，我又开了三年文艺学，还开了现代文选及习作和文艺批评。1954年起，才完全转到中国古典文学教学方面，开文学史，开分段的史、文合一的古典文学。当然哪一段也开过不只一次。到六十年代才专开唐宋段，但只要需要，仍随时兼代过

别的段。有的青年喜欢问：“先生，您研究的哪一段？”这一问，问住了！无法答。其实是不能这样问的。试想，你能问郭沫若先生研究哪一段吗？能问闻一多先生研究哪一段吗？不只不能问哪一段，甚至专指哪一方面也很难。因为他们都是多方面的专家，根本不能用哪一段一类框框来套。当然，我不是和郭、闻等著名学者相比，但不能答哪一段，却有类似之处。所以，我写的文章比较杂，文、史、哲都有。如果要概括，那就只好概括在社会科学之内。而这个集子，也就包有这三方面的东西。解放前，使用文言文写的还占着重要地位；解放后，没有再使用文言文了，但半文半白的情况，仍存在着。

这个集子中的文章，是我所写大约百篇中的四十三篇，由青年同志王晓枫抄出来了。但其中有的很难抄，特别是当时印刷品纸张坏、排字质量差，不少湮漫不清之处，为了辨别一两个字，往往要费很大劲。这真不能不感谢她的耐心！抄好了，编，仍很困难。费了不少踌躇，姑且把它分成四部分，每个部分略以内容先后为序。算是多少有些次序，意义不大，也无庸赘述了。

学术上的讨论和交流是必要的。道理不言而喻。那种“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变化，早已不在人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了。一切为了前进。詹詹小言和炎炎大言，是不妨同堂并发的。所以这个集子，作为个人的一知半解，或者相当于愚者的一得吧，如有可以对同行们起点参考作用之处，那将是我的幸福；同时，如得到同志们具体指教，那更将使我获得教益。

集子中的文章，包括的时间既那么长，立场、观点、方法，都难免存在问题。为了不违背写作时的时地情况，除个别字句的校正外，没有作什么改动。

以上一些说明，就算是这个集子的序言吧。

姚奠中

1984年11月10日

目 录

书注与读书法.....	(1)
论治诸子.....	(6)
《庄子》内篇间绎.....	(14)
《礼运》大同辨.....	(25)
安徽学风 (上)	(32)
儒法及其他	
——《儒法斗争史》批判	(44)
《诗经》其书.....	(63)
《葛屨》新说.....	(70)
释《绸缪》.....	(74)
《衡门》新说.....	(77)
《国风选译》试评.....	(79)
试谈作为文学家的庄子.....	(89)
关于屈原的有无问题.....	(98)
屈原其人其赋.....	(103)
司马迁的传记文学.....	(110)
《史记》《律》、《历》本为一书说.....	(131)
《史记》中《日者》、《龟策》两传中的问题.....	(134)

论《陌上桑》…………… (137)

论《孔雀东南飞》…………… (139)

政教中心和现实主义…………… (143)

——对汉代诗论的一些探讨

李颀里居、生平考辨和他的诗歌成就…………… (153)

王之涣《凉州词》的真面目…………… (165)

唐诗札记五则…………… (173)

杜甫的学习和创作…………… (183)

高度的概括 鲜明的形象…………… (193)

——杜甫《哀江头》赏析

杜诗《最能行》辨…………… (200)

杜甫的服色…………… (204)

九世纪的伟大诗人——白居易…………… (207)

——为纪念白居易诞生一千一百七十五周年而作

《长恨歌》的主题…………… (212)

柳宗元的读书和交友…………… (218)

柳宗元的辞赋…………… (224)

——柳宗元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之一

柳宗元的诗歌…………… (237)

——柳宗元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之二

柳宗元的文论…………… (251)

——柳宗元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之三

《江雪》浅解…………… (264)

唐诗十首…………… (267)

——为初中文学教师学习班讲

语言平淡 风味隽永…………… (273)

——读欧阳修《生查子·元夕》

“古文运动”与“唐宋八大家”	(277)
从唐诗到宋词的演化	(287)
绝句和诗歌遗产	(294)
由词之音律论苏东坡之知不知音	(301)
关于文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306)
关于古典文学作品的分析问题	(313)
——为山西高中文学教师暑期学习班讲	
《山西历代诗人诗选》前言	(319)
《咏晋诗选》前言	(333)
《词谱范词注析》前言	(341)
诗歌的生命与新旧诗的合一	(348)
《姚莫中论文选集》书后	(355)

书注与读书法

古书之难读，由于古语古事之不明；古语古事之不明，由于训诂考据之不备；训诂考据之不备，是书注之未臻完善也。是以欲明先哲之精神，则必先读先哲之书；欲先哲之书之读之博，则必先使其书昭然著明，怡然理顺，而注疏整理为首要矣。

然此大业，未能猝成，于注疏未经整理之前，而欲学者之不废简册，则于此困难之中，犹当有其读之之法，庶不至困难而退，荡灭旧贯，使民族之精神，竟坠于地也。今更申整理古注与读古书之法于次。

自昔注书者，或曰传，或曰释，或曰笺，或曰解，或曰诂，或曰训，或曰说，或曰记，或曰微，或曰述，或曰学，或曰章句，或曰解故，或曰说义，或曰疏，或曰通释，或曰义疏，或曰正义，皆其流也。语其阙也，则汉氏之传注，尚未明经之什伍；①

①章太炎先生常云：马郑注《尚书》，能解者仅得十分之五，至清代孙星衍、江声，始明其六七，王引之、孙诒让始明其七八，余始明其八九，余一分尚须请生勉之也。

语其芜也，则释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①阙则晦而不明，芜则劳而少功，此其所以未善也。予尝论经传以下书注之失约分三端：

一曰：但明典故，而不详本义也。如郭璞之释《尔雅》也。于“哉”、“俶”、“落”、“权舆”，“始也”之下，则云：《尚书》曰：“三月哉生魄。”《诗》曰：“令终有俶”，又曰：“访予落止”，又曰：“胡不承权舆”。于“林”、“烝”，“君也”之下，则云：《诗》曰：“有壬有林”。又曰：“文王烝哉”。此皆但言其出处，而“哉”、“俶”、“落”、“权舆”之何以训“始”，终未明也。“林”、“烝”之何以训君，亦未明也。又如李善之注《文选》也，于傅季友《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伊洛榛芜，津涂久废”下注云：“《蜀志》许靖《与曹公书》曰：‘袁术方命圯族，津涂久塞’。”于“伐木通径，淹引时月”下注云：“《东观汉记》曰：‘岑彭伐树木开道，直出黎丘’。”此皆广采群书，而于“榛芜”、“津涂”、“淹引”之旨，固未明也。

二曰：但录事实，而不求诂训也。如《文选》于刘越石《答卢谌书》“国破家亡，亲友凋残”下注云：崔鸿《前赵录》曰：“刘聪僭位于平阳”，又曰：“聪遣弟曜，攻晋破洛阳”。又曰：“遣子粲攻长安陷之”。而于“凋残”之义则不言也。又如裴松之注《三国志》，则备采异文，详录佚事，文语之释，初不涉及。（文繁不俱引）

三曰：但诠大旨而不问字诂也。如王逸注《楚辞》屈平《卜居》“屈原既放三年”下云：“违去郢都，处山林也”。“不得复见”下云：“建造策谋，披胸心也”。“蔽障于谗”下云：“遇

① 桓谭《新论》云：“秦近君说《尧典》篇目，十万余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

谄佞也”。“心烦意乱”下云：“意愤闷也”。“不知所从”下云：“迷瞽眩也”。而于各句之文字，竟不释矣。

以上三失，皆非作注者之学识不博，用力不勤，乃因其注意点之不同，故遂失解书之本旨。至于训诂之未精，考据之未确，与夫“望文生义”，“增字解经”之类，此属于作注者本身之功夫与其本书之优劣，此不俱论也。

三

上既言古昔书注之失如彼矣，则读之者，自不易了。而整理之方，不可不求也。盖注书者，欲其意不明者，固注而遂明也；事不知者，固注而遂知也，故必训诂考据，二者并备而后可。兹拟作注之要点如次：

一曰字音：凡本读、异读、叶音之属属之。

二曰字义：凡本义、引申、借义、通用之属属之。

三曰名物：凡草木鸟兽典章制度，异名同实，同名异实之属属之。

四曰故实：凡史实掌故之出处始末之属属之。

一二为训诂之事，三四为考据之事，若以此为例如，就各书之所涉及者，依次而释，则整齐画一，条理井然矣。清季朴学者流，学博力勤，于此二事，皆优为之；然其弊也，又多失之繁芜，故以王伯申，郝兰皋之博精，其所为书，犹多冗辞，此则剪裁之功，亦注书之要事也。如：

《释诂》“哉”训“始”，郝氏疏之云：“哉者，才之段音。”《说文》云：“才，草木之初也。”经典通作哉。《尚书大传》云：“仪伯之乐舞萐哉。”《诗》云：“陈锡哉周。”郑俱以“哉”为“始”也。郭注下文“茂勉”，引《大传》“茂哉，茂哉”，《释文》或作“茂才”。《书》云：“往哉汝

谐”，《张平子碑》作“往才汝谐”。“哉生魄”，《晋书·夏侯湛传》作“才生魄”。是才、哉，古通。

案此一段，除明“哉昔为才”外，但举一有力之证即可，不烦多引。而正续《经解》诸儒之著述，繁冗尤甚，所以不免“支离破碎”之诮也。^①此言为注者，但当求其义之昭晰而已。

四

上既明各书注之短矣，而其长亦可得而论。故读之之法，必先明其短长。盖各书之注，以其注意点之不同，故必偏废，然亦其偏废之故，而有偏长。约而言之可分四类。

一曰详训诂：（包括考据而言）汉儒之书是也。

二曰明大义：宋儒之书是也。

三曰备掌故：《文选》李注之类是也。

四曰重文法：世俗之文注是也。

因此四长，衡以所需而用之，自异于盲目求之者矣。盖世之读书者，其目的所在，亦不外四端。

一曰欲求深造也，二曰欲求应用也，三曰欲求多闻也，四曰欲学文章也。

如欲求深造，则当先求训诂之通。欲求训诂之通，则当精研于文字形声义之学，而后可以据之以明大义，而后可以因之以获新义，而后可以明前人之所未明，通前人之所未通，而后一经群经，至于诸子百家，无不淹贯，要必以一名一字之彻底始。

如欲求应用，则当首以大义为重。虽训诂之事，仍不可废，然于古注之中，但择其善者为依据，固不必一言一物，事事研讨

^①自魏晋义疏以来，迄于清季，疏证日繁，一字之释，往往数十百家，注篇累牋，转相钞录，若一分析之，而其字之义，或仍未解，此最宜剪裁者也。

之也。故一篇之内，要义不过数点，一卷之中，精华亦自有限，取其助我而已，何必尽详。

如欲求多闻，欲学文辞，则习掌故储其材，别文法以利其器可矣。然此于读书之事亦未矣。且为文者，首须“言之有物”，次须“言之有序”。亦即所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而有物，有序，有故，成理者，必先预之以学。故留意于掌故文法者，仅可为初学言之而已。

五

要之，整理书注，为发扬固有文化中刻不容缓之事，惟与民国以来整理国故者之所为有别。盖整理书注，欲其“简”、“当”，而整理国故者，犹绎其余绪也。^①至于书注既善，学者易攻，其效之大，可不待言矣。今学者苦无善注，但能先定本身读书之目的，而后因其所需，以定进行之途径，庶亦不至徒劳少功也。

此文特就平居读书所感之困难，加以思索整理而成，所引之书，取当发凡，不赅不备，自所难免，识者倘就其意而教之，则幸甚！

作者附志

1943年5月

^①时贤之整理国故者，恒以科学方法为标帜。然考其所为，亦仅为古书多增数解，而此数解，又未必能合于原意也。至其造说不根，牵强附会者，尤不在少。所为益多，繁芜益甚，是国故终未能整理也。

论 治 诸 子

引 言

诸子初兴之时，各尊所学，各行所知，其所言论，皆与当时社会相切合，虽各家注意之点不同，而其人俱存，则与世无隔阂之忧。即其人云亡，而其党徒或皆亲见闻而知之，虽有改易，其大体不至隐没也，及旷日既久，传授都绝，“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此指语言文字之流变言）而后人所处之时势，又与古迥不相侔，于是诸子之言，“暗而不明”。后之人，或理其训诂，或征其事迹，虽用力之勤，而其能否得诸子之真，未可知也。韩非有言：“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相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显学篇》）况居二千余年之后，以尚论二千余年之前者哉！然学术之进展，在于因故而创新；学者之任务，欲其穷原以竟委，惟其得真之难，而治之之术，乃不可以不究，爰以所见，略陈于次。

一 论前人治诸子之得失

两汉以来

秦火而后，诸子销声，向歆父子之《七略》，乃有整理诸子之

专篇，然其言廛曰：某家者流，出于某官，其长何在，其弊如何而已。（《汉书·艺文志》即袭《七略》者）其渊源当否，今所不论，即其所论“长”、“弊”，亦廛视某一流派之趋势，于各家固未能一一深究也。（刘向《别录》间有存者，亦仍止概括各书之大意而已）

魏晋人偏好《老》、《庄》，平叔、辅嗣与阮、嵇诸人，偶有妙论，然每与《老》、《庄》本旨不合，以其思索多而用功少也。郭子玄唯以自然解《庄》，亦殊蔽于时习，虽成家言，亦不免“六经注我”之嫌。故其成就，未为多也。自兹以下，迄于宋、明，研习诸子者，诚亦有之，殊少创获可言。

清儒于经典而外，旁及诸子，校勘辑佚，以至注疏，一时称盛。其著述之大者，如《孟子正义》（焦循，原属经部，今以入子部），《庄子集释》（郭庆藩），《荀子集解》（王先谦），《墨子閒诂》（孙诒让）之属，所长乃在名物训诂，考据之事，寻其义理，每不贯澈。其见于《读书杂志》（王念孙）、《诸子平议》（俞樾），所谓“豁然冰释”，“怡然顺理”者，亦特在章句之间，不及一书之通旨，一人之学说也。故即搜绍绝学而言，清人之功，为不可没，然其成就，亦适至是而止。

现代各家

胡适之曾言：“至章太炎，始于校勘、训诂之外，别成一有系统之诸子学。《原名》、《明见》、《齐物论释》，皆为空前著作。其所以如此精至者，以其精于佛学，先有佛家之因明学、心理学、纯粹哲学，为比较印证之资，故能融会贯通，于墨、庄、惠、荀学说中，得一系统”云云。（详见《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此言太炎先生之成就，在其于诸子之能作系统之研究，而其所以能得系统，则在以佛学、心理、哲学比较印证。胡氏所评当否，今所不论，惟胡氏之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实即欲采用此法，而以西洋哲学为比较印证之资也。

近人治诸子，皆喜比附西洋哲学，观其书中，充满“宇宙论”，“本体论”，“方法论”等名词可知，而胡适之、冯芝生实为其冠。（胡、冯二氏尚不拘泥其名词）不知于中国各家学说无深刻之研究，则比附大未易言也。（以下就哲学史立论，以哲学史中诸子为主要部分故也）

蔡子民之序胡氏《中国哲学史大纲》也，极推重其“倚傍西洋哲学”，“以构成适当形式”之为难能，冯芝生于其《中国哲学史》之《绪论》中，首即谓“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是胡、冯二家皆以西洋哲学为骨干以研究中国哲学，而周秦诸子部分，彼等亦即以此法治之也。

然所谓“倚傍西洋哲学而构成适当形式”者，以中国本无此形式，而不得不倚傍西洋以构成此形式也；夫以本无此形式之诸子，而加以外来固定之形式，其吻合与否，与吻合之程度如何，与是否有削足适履之弊，至足虑也，且其可以此形式括之者，为全部？抑一部？为主体？抑枝节？其不能以此括之者，皆为无价值？抑尚有价值？此皆首宜注意之问题也。

又所谓“就中国历史上各种问题中，将其可以西洋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录之”者，是先承认中国学问中一部分可以西洋哲学名之也，此言极有分寸，而吾人更宜注意者，则在除此一部分外，是否尚有高深精要，最可宝贵之学问在也。

就中西哲学之实质而言，其不同至为显著，其同者非枝节，则其表面也。西洋哲学中之宇宙论、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之属，诚皆可以由中国诸家学说中抽出之；然此所抽出者，显非诸家精神之所在，盖彼主于求“知”，此主于求“用”，基本态度即不同也。如老、庄、孟、荀之言宇宙（即言天、言自然等），非以求知宇宙之底蕴，乃在于说明“人……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天地与我并生”（《庄子·齐物论》），“存心养